

◆史海钩沉

“皖”字溯源

郑炎贵

学界公认,安徽之“皖”,缘在境内有皖山,即今天柱山。西周时期,周天子封皖伯大夫于此,皖公仁政爱民,治理有方,百姓拥戴,久久怀念,于是便尊称天柱山为皖公山,水曰皖公水,城曰皖公城。安徽省简称“皖”即源于此。

文字是文明的最重要载体。覆盖十四万平方公里的江淮人口大省,冠以一个大大的“皖”字,其诞生与演化的历史如何?

这要从我国文学的源头——《诗经》说起。

《诗·小雅·大东》有云:“皖彼牵牛,不以服箱。”这里的“皖”即后来“皖”的古字,本意指大目,眼睛突出貌,引申形容明亮光泽貌。全句译过来便是:“牵牛星儿闪亮,拉车可是不成。”

按余冠英先生考证,《小雅》大致产生于西周末与东周初,也就是说在二千七百多年前就已有最早的“皖”字出现,但其时未见文献记之为地名。“皖”,按形声造字法,即以目完声。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徐铉校定本载:“皖,睪,或从旱。”随着文字使用变化,相继有“皖、皖”等异体出现,形成“皖、皖、皖”三者混用于地名现象,但以“皖”为多。清代训诂大家段玉裁认为“时俗任意通用”。

那么最早用“皖”来表述今皖西南一方地名者,见于何书呢?有人认为是“东汉王充的《论衡》”,其《验符篇》载:“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庐江皖侯国(民)际有湖,皖民小男曰陈爵、陈挺,年皆十岁以上,相与钓于湖涯。”文中记述的皖侯国,其时为庐江郡皖县地,陈氏兄弟在皖城边上的湖(今潜山市城南有西湖)中,竟然钓到黄色器物,开始年幼的兄弟以为是铜器,后经父亲乃至地方官认出为黄金,且达十余斤。这里的皖侯国、皖民,均用的是“皖”。

然而笔者在研究地方志过程中发现,更早用“皖”为地名者,还是西汉的太史令司马迁。虽今本《史记》中已不见“皖”之名的一段文字,但所幸的是唐杜佑《通典》卷第一百八十一载:“舒州……古皖国也”。其后有注:“春秋时有皖国,《史记》曰:‘皖,夏姓,皋陶之后’”(与此基本一致的文字还见于宋初乐史《太平寰宇记》卷第一百二十五)。可见,唐杜佑当时所见的《史记》与今已有亡佚的《史记》不同,幸亏《通典》引述了,才得以晓之后人。

皖国正式记入史书文献,已妥妥的有二千一百多年了。

接下来,可检索到涉皖之文的有《汉书》。其地理志卷第八上载庐江郡所辖之“县十二”,其中就有“皖”县。《汉书》注本中以唐颜师古注本最著名,颜氏在《汉书叙例》中说“《汉书》旧文多有古字”,今则“曲核古本,归其

真正”。然而,颜注本在流传中又逐渐形成多种版本,各本文字各有异同,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汉书》采用刊行最早的北宋景祐本为底本,并参照吸收诸本之长而定型,其相应文所用为“皖”;而之前的商务印书馆刊行的“百纳本”《汉书》相应处则用的是“皖”;稍后的《后汉书》“郡国志”庐江郡条下载“皖,有铁,居巢,侯国”,此“皖”当为“皖”之缺笔,系微别,据行家云,当与书写习惯相关,如把“皓”写成“皓”,“皎”写成“皎”。

在唐宋时代,今皖山(天柱山)已成为朝野闻名的佛道圣地,故史料中关于皖之地名频率达到高峰,而且还出现了以山为偏旁的新造形声字与借字,如唐大历间任舒州(州治皖城,即今潜山市城)刺史的独孤及作《祭皖山文》;唐五代诗僧释齐己,作《浣口泊舟晓望天柱峰》;宋僧觉范的《甘露灭斋铭并序》云“三祖,北齐天平二年,得法于少林,隐于山”。其所用“皖、皖、皖”,按文义,皆指皖地的山水地名无疑。后来的康熙字典中也明载:“皖……又户版切,音莞,山名”。

与上述形近字离得更远点的有辽僧释行均所编的字书《龙龕手鑑》,其中载:“皖,今皖,正胡管切,明也,又县名。”该书现存接近原刻本的有高丽本,故当为传递入朝,形成孤本之特例。

综上所述的各种与皖相关的异体字,从造字根源看,不外乎这样几种情况:或因形近微别在传抄或刊刻时致混,形成一种习惯写法,史上关于偏旁“白”“日”易混者,并不少见,如“皤、皤”“晓、晓”“皦、皦”“昀、的”皆如此;或开始来源有别,但后来被广泛通行,层累而入典,形成一身多义字,如皖,本义为大目,有明亮、浑圆义项,后来又用作地名;而“皖”字本义为屋外已现白光,屋里有人起身,有专家认为皖族本有崇尚曙光为图腾的意思,堪称一片向往光明的邦土,至宋人用之则相互替代;或以形符替换字而更切近所指地名之义,比如唐人在皖来皖去中,大概觉得还是皖公山更厚重与灵秀,故当诗性文化创意盎然时,造出了“皖、皖”来。

语言通过文字记录而成文献,文献反映着文明与文化的历程。通过文字了解文化源流,亦可鉴古知今。

有专家统计,民国之前,历代文献中用“皖”多达3528例,涉及文献多达1378部,而“皖”或“皖”各不足百例。历史上“皖”地政治文化中心长期位于皖公山下的皖城,即今潜山市城,虽然宋末移府治到现今的江边安庆,但“皖”作为这一方的简称一直未改变。特别是安庆成为省会后,遂以“皖”为钦定的简称,安徽境内的长江段从此有了“皖江”之称。王荆公曾上表说:“唯此邦土之名,昔者宦游之壤”“久陶圣化……积习仁风。”唐宋间皖地曾得誉为“山水之国”。到了清代,桐城派开山祖方苞便常以“皖”称省乃至省会安庆;书法家邓石如自号“完白山人”,其意正在“皖”,其所追求正在洁与明;京剧鼻祖程长庚为许多史家记为“皖人”;民国北平城专辟有“皖中会馆”,接纳过包括名噪南北的作家张恨水等在内的诸多皖籍人士……可见,最具安徽文化底蕴的词,还真是非“皖”莫属,至今“皖”留为安徽简称,实乃势所必然,理所当然,情所宜然。

◆流年碎影

汪河牛灯

张全海 文/图

怀宁县洪铺镇有一块“金鸡碑”,这块碑的名气很大,戏曲界对其多有研究,我也曾撰文考证此碑的树立时间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金鸡碑上铭刻的信众很多,但因历经数百年的风雨,上面的人名早已斑驳难辨,不过可以看出其中至少有5位是来自附近的嗣徽堂汪氏,这在汪氏的族谱里能找到对应信息。

一些人认为金鸡碑与戏曲有关,这个观点不管是否有道理,附近一带为戏曲之乡则是名副其实。安庆地区的戏曲鼻祖阮自华曾在这里活动过,阮大铖的嗣父进士阮以鼎就葬在



汪河牛灯道具

金鸡碑不远处,他们都是明末安庆戏曲文化的开拓者。据传当地汪氏在明代就有“汪家班”,他们至今仍传承有牛灯戏这一古老的戏曲演唱形式,2010年还被列入安庆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我在上大学期间发表过一篇《家乡的灯》,其中就写到了老家的牛灯。我的老家张屋也在洪铺镇,跟汪氏分属不同的行政村,听长辈说,张家原本不会出牛灯,民国时期从汪河学来的,是我曾祖和祖父那两代人的事情,我至今还记得祖父唱牛灯戏文的声音,“自离皇城……”,高亢洪亮、古意盎然,当时他应该是我们生产队唱得最好的老人。在我记事以后,老家出过三回牛灯,第一次是1984年正月,第二次是1993年正月,这两次我都参加了,第三次是2012年正月,我当时在北京没有买到回去的车票,所以错过了这次出灯活动。

汪河的牛灯无疑是最正宗的,据当地人汪李俊《皇匾昭雪牛灯冤》一书说,牛灯戏是汪氏远祖汪华被贬归里后为洗冤而编演的灯会,借尉迟恭被贬耕田故事来倾诉冤屈,后随族人迁徙流传到洪镇汪河。此说或仅为口传,找不到文献依据,但牛灯戏的唱本《尉迟恭耕田》(也叫《敬德耕田》,或简称《耕田》)确实是很早的文本,最晚在明万历年间的弋阳腔、青阳腔剧本单出选集《玉谷新簧》中已有收录,故宫博物院编的《昆腔单出戏》中也收录了《敬德耕田》的手抄唱本。《敬德耕田》为《金貂记》的单出戏,应该说其戏本流行比较广泛,被多个地区唱腔采用,流行于怀宁的唱腔应该属于青阳腔体系,高腔特征十分明显,有人说是石牌高腔,或乐佛腔,听起来就像当地的道士唱经。

牛灯演员主要有两人,一人扮尉迟恭(老爷),一人扮家僮(童儿)。道具主要就是一头用竹木做成的水牛,外面糊上黑色剪成细须状的纸,算作牛毛,另外还要制作一张道具犁,还有竹鞭和木轭这些小件道具,当年我曾亲眼目睹父亲制作道具的全过程。牛灯在当地被赋予神圣意义,灯班走到每个屋场,每家每户,“接灯”时要用上好的红色绸布“挂红”,最为讲究的当属牛绳子,一般是用双股红头绳做成,每到一处都有人抢着第一个来“换牛绳”,就是用自己准备好的牛绳来替换演员手中牵着的牛绳,传说这样可以求得好运,尤其是能早生贵子、多子多福,所以换牛绳还要给一定的喜钱才行。

汪河的牛灯年代久远,但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灯的次数并不多,且节目越来越不如以前完整,“文革”期间完全停止了演出,一些祖传道具也遭损毁,直到1980年代初才得以大致恢复,2009年当地政府出资组织了一次演出,并录制视频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像资料加以保存。最近听说怀宁县准备将汪河牛灯进一步申报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真心祝福他们能够顺利申报成功,在这个古老文化日渐濒危的情况下,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延续一线生机,为我们子孙后代保留一点家乡戏曲文化的火种。

